第一章　苦难童年

我的祖籍是河北省涉县下庄村，1916年12月6日（阴历十一月十二日）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。在我出生的前后几年，连遭荒旱，特别是1920年(民国九年)灾情严重,当时一家老小,难得温饱。兄弟五个，我是最小的，全家都是吃糠嚥菜,有时，姐姐分给我一点乳汁（我姐姐的大女儿与我同岁）。父亲在黎城县的一家骡马店临时帮工，在我3岁的时候，因为又饿又病，死在黎城，终年48岁。在家境十分穷困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母亲想把我卖掉，便托人找到一家没儿没女的买主。我舅父听了之后，坚决反对，所以没有办成。当时靠我舅父家和姐夫家借贷帮助，维持生活。大哥在外学木匠，二哥在磁县彭城瓷厂当学徒，三哥四哥年纪都还小。在我4岁时,大灾之年,再也生活不下去了，被迫作出了逃荒的打算。那个时候，豫北

冀南,连年荒旱,天灾人祸,民不聊生,逃荒在外的人很多。有人说，襄垣县这个地方比较好，那里地广人稀,气候稳定,种庄稼见苗三分收,租住窑洞，租种土地，都比较容易。因此，决定逃荒到山西襄垣县。这个县和涉县只隔一个县，叫黎城县，都在晋东南，都属太行山区。

就在 1920 年初冬之际，一家老小，在崎岖的山路上,在乱石的河滩里,一走一歇,在 70 公里的旅途中，整整走了三天。一条扁担，两个萝筐，一头是锅，一头是我，锅内外放的都是些杂物，我是紧紧抱着一个小被窝。一路上哥哥挑着提子负担最重，又苦又累的母亲还要照料瘦得像猴子一样的我。哥哥说，只要在路上死不了，到了上王村，就有办法。随后，我伯父一家也逃到了襄垣县王家庄落了户。逃荒前后的情况，都是在我长大以后，听母亲诉说的。

上王村有两条大沟，我家在南大沟西边姓郭的家租了两孔窑洞，一大一小，睡的都是土坑。那里距五阳岭煤矿很近，去扫一担煤，可以烧好几天。

住土窑,有煤烧,屋里很暖和,只是肚子叫,全家生活苦，日子很难熬。全靠在涉县老家的亲戚支援点，向左右邻居借一点，哥哥在外打工赚一

点。就这样，母亲还是盼我快点长大。

一年半以后，生活开始好了一点。租种的五亩地，有了一些收获。收获不大的原因是，租的土地，路程远，土质坏，肥料缺。这时候虽然还是以糠菜为主，但是菜汤中的小米多了一点，黑窝头里黄色多了一些，特别是我吃的玉米糊黄窝头比较多了。这是因为哥哥，特别是母亲都很心疼我，因为我最小。

在上王村住下来以后的情况，我已经都记得了。有三件事记得很清楚：一是我家欠姓郭的一笔债，那老头子催欠账时，总是坐在那个仅有的一张椅子上，手里端着一个水烟袋，呼噜呼噜地吸个不停，吸了一袋又一袋，满地撒的是烟灰，一坐就是大半天。母亲听着他的训斥声，感到非常无奈，我看着他呼噜起来没个完，实在感到心烦。1965年,和我在一起搞‘四清’的荆州军分区董政委,他有一个水烟袋，可里面装的是酒而不是水，有时我也想吸上几口。每当我端起水烟袋时，就想起了当年那个令人十分讨厌的催债人。二是我害病时,三哥去请了一位‘神汉’给我‘下神’治病。只见那个神汉端坐炕头，口中喃喃自语，不知他说了些什么。只见他手执柳条，东指西划，说是正在驱鬼。完了以后，那神汉除拿走应得的一尺红布外，

竟将用作插香的一碗小米，全部拿走。母亲在那时候望着空碗,含着眼泪,此情此景,我的病痛不但没有减轻，反而加重了。三是母亲从地里劳动回来的时候。在路上把腿摔坏了，请当地放羊的老羊倌进行治疗。在接骨过程中，用醋拌糠敷扎患部。母亲由于疼痛难忍,泪流满面的情况,使我永远不会忘记。我既记得全家人的穷困，也记得我苦难的童年。

集　　句

越穷越生，越生越穷。
饥寒交迫，死里逃生。
逃荒山西，记忆犹新。

第二章　十岁入学

农村里的孩子，上学都比较晚，一般要到八、九岁才入学。山沟里的儿童，有的根本上不了学，在家干活，扫煤打柴放牛放羊。因我年小体弱，这些活我基本上都没有干。为什么我 10 岁才上学呢？就因为没有裤子穿。要上学读书，总不能穿得太破烂。我家土炕前是一个锅台，锅台前边有个坑，用以盛煤渣。在冬季严寒季节，白天我就蜷缩在煤渣里渡日。10 岁的时候，破天荒穿一件补丁很少的衣服，并第一次穿上了棉裤。

在西沟边的时候，一共搬了两次家，换了两个房东。窑洞门前面临的都是大沟，三哥为了离开这个西沟边，说是在狮子口能找到个新房东。在第三次搬家前，四哥带我去入学，首先是向孔夫子像磕头，然后向先生行鞠躬礼。课本刚刚换过，已经不是论语和孟子，换成了语文和算术。入学前

我四哥教过我识字，一些阿拉伯字母，我都会认会写。我在校学习的成绩不错，先生经常夸奖我。我每次交的‘仿”,所写的毛笔字,先生都用红笔画了不少圈，先生夸我，母亲哥哥都喜欢。母亲是个文盲,不识字,但她知道,凡是画了红圈的字,都是写得最好的。上小学第三年，第三次搬家到狮子口，离学校很近，房东是个单身汉，经常不在家。他的邻居,有个亲戚,名叫米维书,郭庄村人,是县立第三高小的校长。全县共有三所高小，第一高小在城关，第二高小在 虎 亭镇,第三高小在下良镇。春节期间，米校长看见我的作业本很整洁，先生的批语都很好，就建议让我去上第三高小，可以插班。关于上不上高小的问题，家里人意见不一致。大哥说“:自古道‘穷不读书,富不学艺’,最好是不去。”母亲说“:咱杨家弟兄九人(我伯父四个儿子）没有一个读书的，要想叫人看得起咱，家里最好有个读书人才好。”三哥说“:既然米校长看上了，又可以插班，虽然离家远一点，还是叫小五去吧。”(小五是我的乳名）

春节一过，大哥去太原兵工厂做工去了，二哥往彭城瓷厂走了，三哥挑着行李和米面，送我到下良镇第三高小入学。在两年半的时间里，我的各门功课都很好，得过全班第一名。虽然有人嫉妒

我，我只是下苦功埋头读书。因为我觉得，如果功课学不好，就对不起送面送米的三哥，更对不起在家里仍离不开糠菜生活的母亲。我上高小第二年，四哥患痨病去世，那时候对肺结核病还没有办法治,他死时才 20 岁。

大哥在兵工厂，专做步枪的枪托，计件工资，省吃俭用，每年都要往家里寄些钱，家境已不像以前那么困难。又买了八亩地，全靠三哥一人耕种，母亲虽是小脚，也经常下地劳动。1932 年我高小毕业的时候，学校还送来已印制好的喜报，全家都很高兴地接待了送喜报的老头。当年是不是继续升学，又成为一大难题。襄垣县没有一所中学，到长治市上中学，除自费外，还得交学费，实在是上不起，所以没有报考，随三哥在田里一起劳动了一年。

襄垣县有一所县立简易师范学校，培养目标是小学教员。那时候，一般都不愿意读师范，有所谓‘ 家有三合粮,不当孩子王 ”。因此,学师范的都有优待，学校不收学费，还有津贴。1933 年我就去报了名，在录取榜上还名列前茅。在两年的学习中,我还为学校刻钢板、印讲义,有点报酬,所以全年的伙食费零用钱，都不要家里负担。在校第二年，因患病在家，超过了假期，学校就把我开除

了。我三哥托人讲情,并送了些礼物,才允许我继续上学。毕业前进行实习时，老师夸我在教学方法上启发式教学运用得好，几门功课，都是高分，毕业榜上，又是名列第一。学校生活到此为止。

集　　句

插 班 高 小 偶 机 遇 ，
读 书 原 为 光 门 第 。
高 小 师 范 均 榜 首 ，
母 亲 哥 哥 都 欢 喜 。

第三章　小学教员

简易师范毕业后，1935 年下半年我到贾岭村帮助原任教师代了一个学期的课。这个村子小，学生少，感到能够胜任。第二年到付村任教。那时候的制度，是招聘不是委派。那个村子较大，学校属于甲级，三个年级，一个教员，一个教室，单式教学，难度不大，但头绪较多，也够忙碌。村里给学校配有炊事员，一个月 20 斤米，10 斤面，另外工资五元（硬币）。课余时间，和村里的学董、村长以及一些富户人家的老人，都有来往，相处得都还好。村民见了我，都称呼为先生。当时我感到当个小学教员，在村里还是有一定的地位。各年级学生（都是男生，没有女生），对老师都很尊敬。我对功课差和表现不太好的学生都是耐心教育，从未体罚过学生。

这一年，山西军阀阎锡山推行的“主张公道

团”是个反动组织，每个村都要建立这个组织，并规定小学教员，是公道团的当然文书。那时山西省公道团发有一种反共小册子，通篇都是对共产党的诽谤和污蔑，还编有反动歌。这些歌曲，我从来没教过。村团长有点文化，我帮助他办事不多。

这一年，因为有了大哥的收入，除添置土地外，还买了房子，由狮子口搬到沟北，这是第四次搬家。

就在这一年，母亲患了“噶食症”,也就是现在说的食道癌，开始还喝点汤食，最后汤水不下。二哥听说鹅血可治此病，到处找鹅，后来终于找到一只鹅，杀了鹅，得了半碗血，但也无济于事。母亲一辈子受苦受累，在家境刚刚好了一些的时候，却一口水也不能喝,与世长辞,终年 64 岁。

母亲信佛讲迷信，经常烧香念佛经。有一次我问她，你经常烧香拜佛，咱家为什么还是这样穷？她说，这是命里已注定。我说，既然命里已经注定，就不要再烧香念经了。她说，你不懂，不求今世求来生。母亲深信佛教宣传的“轮回转世，因果报应”。

母亲病危期间，大哥二哥都回来了，跪在母亲面前，诉说着一生的苦难。在家住了三天，就各自返回太原和彭城。我昼夜服侍在炕头前。在母亲

将要断气时,她还喊了一声‘小五’,似乎还有话没有说出来。

殡葬事宜，主要依靠亲友帮助。三哥和我都随灵柩回到涉县,连同我四哥的遗骨,一起在祖坟边安葬。这是按旧的风俗,叫作‘足下有后’。

付村小学课程,因丧事而耽误了的,我回来以后,都补上了。过了阳历年,我到县城时,看见在县衙门口,贴着一张很醒目的布告:‘蒋委员长安全回到南京。’这就是震惊一时的‘西安事变’。同时，有一个过去的同学告诉我一个非常离奇的消息,有个进城卖烧柴的外地人,被巡警抓走了,因为在他绑好的烧柴捆上,写有一担柴的共计数,就因为有这一个‘共’字,就被怀疑为共党分子。这就是蒋介石的‘攘外必先安内’,‘宁可错杀一千，也不放过一个’的反革命政策。

一年以后(1937 年），我被聘到东北村任教。这所小学距县城只有三里路，离家也较近。这个村子和付村差不多，只是在教室和设备方面稍好一些。这个村也有‘公道团’组织,但团长从未和我谈起担任文书的事。

学生中有个叫王连生的，他父亲常到学校和我闲聊，讲故事，说笑话，和我很谈得来。他说，“九、一八’日本占领东北后,步步进逼。他指着墙

上挂的中国地图说，我们国家，很像一片大桑叶，日本鬼子就像专吃桑叶的蚕，一心想把这片桑叶全部吃掉，胃口大得很。又指着那张世界地图说，我们能和苏联一样就好了，两个国家地面都很大，连接起来，一红一大片。

“七、七”事变后，县城里经常有人来村子里作抗日宣传，有的也经常到学校和我谈论国家大事。有一位自我介绍说是县牺盟会的。他说，日本侵略中国野心很大，要吞并整个中国，现在情况十分危急，全国到处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。山西省除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外，还要建立三十万铁军，这支新军，名叫决死队。

经过几个月的宣传酝酿，我反复考虑一个问题，日本鬼子占领县城后，这个村子就成了敌占区，在敌占区小学怎么办？在敌人统治下，小学教员怎么当？想来想去，出路只有一条，就是抗日救国。于是下定决心，放弃小学教员的工作，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去。

集　　句

初涉社会教小学，
小心谨慎当园丁。

革命形势受熏陶，
决心弃教去牺盟。

第四章　参加革命

1937 年，快放寒假的时候，我跟村里的学董谈了自己的想法,王学董很支持我。他说,现在国难当头,你要走,我很同情,为救亡而走,这也叫“投笔从戎”吧。并称赞我是热血青年。

1938 年，阳历年一过，我就去县城找“牺盟会”。当时,牺盟会就设在城隍庙内,负责人名叫多运海。他热情地亲自接待了我，并约好了春节过后，就去报到，并要我带个箱子去。春节一过，我就带着我当小学教员时用过的竹壳箱子去报到了。牺盟会的组织,负责人的职称是特派员,其他成员,都叫协助员,我是协助员之一。从此我便正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1938 年上半年，组织上分派我到乡下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。我总是从“九、一八”说起,中华民族已到危急关头,乡亲们,有钱的出钱,有力的出

力,全民抗战,誓死不做亡国奴。经过宣传,散发传单和小报（牺盟会办的油印不定期小报《活路》),征兵征粮工作都比较顺利。在乡下,一天到晚都很忙,精神面貌大变样。脱掉长衫和小帽,身穿一套时代装,足穿草鞋,头戴军帽,大有革命战士的情趣和风采,腰系皮带,虽无军装,也感有适于形势的时髦和荣光。

在乡下不到半年的时间,就调我回县里,派我到县武装自卫队第二中队当工作员。当时县里成立了武装自卫队总队,下辖四个中队。总队长、副总队长、中队长都是阎锡山办的军官学校委派的。我和二中队麻队长，相处得较好，工作比较协调。他知道我不是党员，但他对牺盟会有反感。在一起工作了半年多时间,到 1939 年初，县自卫队改编为县独立营，县政府成立武装科。由军官学校派来的总队长、副总队长都自动离队，不知去向。只留下原副总队长田培，任武装科长，我任科员，在一起工作近半年时间，他便携枪逃跑了。

这段时间,阎锡山的“精神建设委员会”,派到襄垣县的一位委员,在开会讲话时说:“现在的统一战线，巩固得非常浓厚。”惹得大家都在发笑。他口口声声要大家团结抗战，实际上他是来刺探中共行动的。本来他们就怕决死队被“八路化”，

更怕牺盟会被‘赤化”。现在他们已经知道牺盟会就是共产党，决死队就是八路军。晋东南有的县，已开始杀害共产党员。在此情况下，撤消了武装科，新建了县武委会，我又被派到武委会工作。县武委会主任是蔡启荣、张平等同志。我也知道，牺盟会实际是个名义，中共襄垣县委员会早已建立，只是没有公开。县委书记是魏效泉同志，县长是徐国华同志。

我入党时间较晚，是由于我的觉悟低，没有主动向党组织提出申请，等组织上找我谈话。直到1941年7月间，县政府收发员李兴华同志才找我谈。他说：党组织对你的情况很了解，早就想发展你。我今天来，就是介绍你入党的，不要预备期，从8月1日起，你就是中共正式党员。我当即填好入党志愿书，交给了他。八月一日，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。

我到武委会后，每天工作很忙。武委会的编制，虽然有组织干事、宣传干事、情报干事，实际上在较长时间内，除主任外，日常工作，只有我一人。

日本鬼子占领县城后，县委会、县政府各部门，都迁到城北庙烟一带。民兵工作，主要是组织训练基干民兵，并配备武器弹药，特别是搞情报工作。上王村沦为敌占区不久，我曾回过一次家，可

巧驻五阳岭的日本鬼子和几个伪军共二十余人，到上王村，在我家大门口的槐树下池塘边停了下来。我二哥闻讯赶快回到屋里，叫我千万不要出去。不到一个小时，一场虚惊过去了。我二哥马上从山坡小路，把我送出去了。当时我二哥是抗日第二区公所的情报员，武委会从二区来的情报，就有他的一份功劳。敌人的三个据点——城关夏店和虒亭,每天都要传递情报,武委会每天都要综合敌人各据点的动态，并印发各部门。在获悉敌人增加,要出发清乡扫荡时,都要动员群众,空室清野,组织群众转移。敌人除了大扫荡外,不断向据点周围扩大维持会，并突然奔袭我根据地的党政机关，暗杀捉拿我抗日干部。有一次曾将我县委会宣传部长冯驭英抓走了。从 1941 年起,情况一年比一年恶化,敌占区扩大,根据地缩小,对敌斗争任务十分严峻，生活非常艰苦。

1943 年 3 月间，县委组织部长崔维庭同志找我谈话。他说，县委意见想派你到延安党校学习，问我有什么意见。我听后，真是喜出望外。我这个入党不满两年的党员，能够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学习，真是求之不得的绝好机会。当时的心情十分激动，十分感谢党对我的培养。襄垣县农会干部王锦隆，也是这批到延安的，他从另一路走